

高教动态

中央财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14年第16期（总第226期）

目 录

- 一、小班教学的中国之路
- 二、芝加哥大学的独家秘笈：做你不会做的事
- 三、南开首设运动辅导站 让学生走出“宅生活”
- 四、上海财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关注农村养老问题

一、小班教学的中国之路

上课人数较少固然是小班教学的特点。然而，只是人数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把比较饱满的大班课堂改成小班课堂，小班教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缺少互动性，选课人数本身较少的课堂，在面积小的教室中开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今年暑假，浙江工业大学与美国韦恩州立大学合作开设了一门

“跨文化工程问题解决”国际化课程。本科生小张有幸入选其中，除了学会利用跨文化、跨学科的基本工程原理，提升了创造力和工程实践能力，他还有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终于敢开口用英语对话了。

在此之前，小张并不习惯用英语对话，遇到类似场合总爱做“南郭先生”。可是，这次他“逃”不了，因为全班仅有30个学生，中美各占一半，每个人都要轮番到台上用英语作报告。

这项意料之外的收获在小张看来，得益于“真正的小班教学”。

日前，浙江省教育厅印发了《高校课堂教学创新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年）》。根据该计划，浙江省将积极推动高校小班化教学，不断推动小班化教学在总学时数中的比例。那么，对于即将或正在展开的小班教学，我们该如何理解呢？

小班教学是什么

两名学生在讲台上一边操作三角形模型，一边解析着勾股定理。台下十来个学生和教师围坐成“U”字形，可以随时打断解析、提问题。这一幅小班教学的影像来自于国内某中学的数学课。

实际上，在国内类似小张所处的本科生小班课堂，并不能称之为常见。小班教学更多地存在于基础教育中，用以弥补应试教育中满堂灌、互动性差等不足。

然而，小班教学这一概念对于国内高校来说并不陌生。

上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叶企孙主持下的清华物理系，一个班级的人数不得超过14人，其用意在于“不使青年徒废其光阴于彼所不能学者”。

近年来，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均对小班教学有所尝试，北大以优势学科经典课程为小班教学的主要试点项目，川大强调大班授课、小班讨论，实行25人的小班化精英教育。

而对于实施现代大学制度的西方高校而言，小班教学的改革始自上世纪80年代，如今已是极其普遍的做法。美国最常用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中，小班教学被作为一项重要的参考指标，成为其高校排名的“敏感”话题。这里所指的“小班”人数通常限定在20人以下。

上课人数较少固然是小班教学的特点。然而，只是人数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浙江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计伟荣表示，小班教学欲实现的是，以教师知识传授为主向以培养学生能力为主的转变。换句话说，把班级变小是小班教学的外在，其内在则是实现教学模式的转变。

“把比较饱满的大班课堂改成小班课堂，小班教学的概念才得以成立。”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杨英锐说，缺少互动性，选课人数本身较少的课堂，在面积小的教室中开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班教学。

带刺的玫瑰

师生在课堂上交流比较少，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学生的选择性比较小...传统大班的弊病显而易见。

慕课的出现即将颠覆传统的教学模式，倒逼课堂由知识传授转变为能力素质的提升。不具备这一条件的课堂，未来将面临挑战。

几乎所有的教育人士都知道小班教学的好处，但是它就像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芬芳诱人却又让人望而却步。

计伟荣坦言，推进小班教学至少有三大难点——
师资不足、教学条件受限、教师小班化教学能力不足。自1999年扩招以来，学生成4倍增长，与此同时教师的增长仅为1.8倍左右，生师比过高、师资尚不足。比之重点院校，地方院校小班教学所需的教室、实验室更是明显不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曾作了一项“大学实施小班教育的可行性研究”，调查显示实施小班教学的费用是普通教学的1.5倍，按5,000元至6,000元计算一年学费，推行小班教育意味着每个学生每年要加收2,500元至3,000元的学费。显然，从经济可行性上来说，小班教学是一项重大挑战。

如果说教学条件受限等硬件上的问题，尚能用拨款、涨学费等方式来解决。那么，像教师小班化教学能力不足这类软件上的难点，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克服。

翻转式的课堂需要教师融入案例式、互动式等多种教学方式。“‘从学校到学校’的新教师教学方法、课堂管理经验不足，尚不足以挑起小班教学的大梁。而对于老教师而言，他们经历了高考恢复后的大班教育，所认可的是不开展小班教育，也同样能把课上好。”计伟荣说。

观念的转变尚待假以时日，但在尚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国内高校，行政力量的推动也时常“好心办坏事”。

在杨英锐看来，能否实行小班教学还应该考虑不同的国情。在美国，实行小班教学有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由于私立大学收取高昂的学费，拉近师生的距离、开展小班教学，让学生、

家长有中产阶级的感觉，就变得有必要了。

然而，国内公立大学不光要承担教学、科研任务，还肩负着稳定社会、兼顾公平的作用。“就像高考暴露很多问题但依然无法取消的逻辑一样，我们要客观地面对公立大学生师比高的现实，有条件的课可以创造条件开设小班教学，条件不足的课如果强推、强开，实际上是变相地向国家要资源。”杨英锐说。

毕竟美国的小班教学也仅占50%左右，行政力量没必要为数字而努力。

研究生主导课程

面对诸多现实问题，小班教学的推进是否难有突破口？

在实际推进小班教学过程中，解决生师比过高、师资不足的另一个方式是让博士生、硕士生担任助教，参与甚至主导小班讨论。

选拔这些博士生、硕士生，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学校向博士生、硕士生发出招聘助教的通知，合格者参与到大班、小班中来；二是按课题组构建，博士生、硕士生作为团队中的一员，由主讲教师进行小班教学上的传帮带。

“关键在于，让不同人扮演不同的角色。如果定位明确，的确会对小班教学起到积极作用。”计伟荣说，比如优秀的博士生、硕士生完全有能力主导习题课的小班课堂。

杨英锐则认为，让博士生、硕士生主导小班教学，并不是一个可取的做法。因为，“讨论的要求比上大课的要求更高”。讨论不只要求教师熟知内容，而且要求其见解深刻、反应迅速，“主持者的水平、功力不够，讨论很容易流于聊天”。相反，大课有作业、笔记等管理上的要求，更适合想要有从教经历的博士生、硕士生学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补充道，主持小班教学的人还要有争论的意识，在讨论中引导学生去辨明真假，培养学生养成思考问题的基本素养。“实际上，要求并不低。”

在他看来，以班为单位的小班教学，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流于形式。“高等教育从整体上来说是在办培训班的模式，而不是办大学的模式。无论是教1个人，还是100个人，教师难改灌输知识的毛病。”

小班教学之外，储朝晖的建议是，国内高校可参考哈佛的选课制度，开设大量的课程供学生选择，同时减掉不必要开设的课程，鼓励教师、助教参与到学生的选课指导中，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由于分散了每堂课上课人数，最后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班教学的效果。

恢复教学生态

新生研讨课、专业课程、大类课程……有条件开设小班课或采取“大班授课+小班讨论”的课程，自然要鼓励。那么，大部分、没条件开设小班教

学的课程，又该何去何从？

在杨英锐看来，把小班教学的优点移植到大班教学中，才是国内高校在实际情况下大范围创新和努力的方向，而且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

杨英锐在美国的课堂本学期为19人，而他暑期在国内高校开课，中山大学为150人，北京大学为130人，竟没有一个人打瞌睡。这其中不仅有教学投入的因素，还有技术层面的秘诀，比如教师上课尽量不用PPT、麦克风，不允许学生课上用电脑，要求学生每周交听课笔记。教师的付出学生看在眼里，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课堂气氛马上凝聚起来。

“事实上，中国在教学生态上的优良传统，优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然而，如今的教学生态正在重科研、轻教学的氛围中逐渐被毁坏。”杨英锐说。

要想恢复教学生态，他认为，相对于强调学术自由的美国高校，中国高校更容易实现——

提倡从校长、党委书记等管理层到全体教师，坚持一周听一两堂课，“听课不是指导他人怎么上课，不是评估他人怎么上课，也不是监督他人怎么上课，而是真正地当一回学生，管授课教师叫一声‘老师’”。

学生能否听懂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形成尊师重道的氛围，相比物质奖励它是更高的荣誉，对鼓励学生认真听课是更好的表率。而听课又恰恰是行政力量可以要求的事情，大大优于教学评估、精品课程建设等要求。”杨英锐说。

来源：《中国科学报》2014年9月25日

二、芝加哥大学的独家秘笈：做你不会做的事

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John

W. Boyer（约翰·博耶）先生来访北大时曾经说过一句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话：芝加哥大学对学生的基本要求是，做你不会做的事。

一个人怎么能做自己不会做的事情呢？这难道不是一种强人所难的过分要求吗？但这种看上去有悖常理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理念却保证了芝加哥大学出类拔萃的人才培养质量，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芝加哥学派”，使芝大成为全世界的学术研究中心。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是特点非常鲜明的一所大学，有自己的独得之秘。也许哈佛大学培养出来的思想家最多，耶鲁大学培养出来的政治家最多，普林斯顿大学培养出来的科学家最多，但培养出世界上最多的顶尖级教师的，除了芝加哥大学，再找不出第二个。

认真研究芝加哥大学的人才选拔和培养体系，就会发现，“做你不会做的事”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或要求，实际上蕴涵了先进的教育理念、极高的人才培养标准和深湛的哲学思维。

做你不会做的事，首先要求你具备一颗野心勃勃的企图心。做不会做的事的人不同于一般的人，不会满足于一般性的工作，而是胸怀远大的理想抱负，渴望实现创造性成果，立志成为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人。野心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含有贬义，往往和阴谋、不安分守己联系在一起，不符合中国人“中庸”的要求。但实际上，创新往往由这类野心勃勃的人实现。他们从不安于现状，总是对权威和现实充满怀疑精神，思维处于高度活跃状态，善于从已有的事物中去发现新的创新点，从而成为引领某一领域的领导者而非追随者。

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和社会中真正的精英，并且非常享受“成为第一”的感觉。如果哥白尼死守着托勒密的“地心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就不会有“日心说”的诞生。如果爱因斯坦被牢牢局限在牛顿的经典力学里，就不会有二十世纪伟大的物理学革命。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生活领域更是如此。如果乔布斯认同IBM和微软的地位，如果李秉哲认同乔布斯的地位，如果马云认同e-

buy的地位，那么，今天这个世界就不会出现苹果，不会出现三星，也不会出现阿里巴巴。为什么会是他们？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都是茫茫无际的“人类无知黑幕”；他们所做的，或者说他们想做的，都是他们以前不会做，也许除了他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做的事情，而且在做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可能成功。事实上，如果真的你做到了所有人不会做的事情，那就意味着你实现了创新并引领了一个新的时代。

做你不会做的事，要求你具备挑战自我的勇气和能力。做不会做的事的人往往自视极高，总是处于“不知足”的状态，不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决不罢休。他们给自己定下一个又一个看起来无法实现的目标，然后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努力来实现。就像一个登山者，一次又一次去攀登更高的顶峰，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

在芝加哥大学，这种自我挑战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和培养，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张五常曾经讲过一个关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产权经济学的权威阿尔钦先生上课的故事。在上第一堂课时，阿尔钦先生向同学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假若你在一个有很多石头的海滩上，没有任何度量工具，而你要知道某一块石头的重量，怎么办？”整整一堂课五十分钟，学生们围绕这一问题，绞尽脑汁地提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案，但每一种都不能令人满意。到了第二堂课，学生们以为老师会告诉他们答案，讲授经济学原理，但阿尔钦先生走上讲台后，提出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整堂课学生依然围绕这个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每一种方案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第三堂课照旧。就这样，一个看上去简单到近乎幼稚的关于“石头”的问题整整讨论了一个月。学生们对此大惑不解，但越是这样，他们越不相信大名鼎鼎的阿尔钦先生会以这样的方式来上课，其中必定大有玄机。直到第五个星期，学生们再也提不出任何新的方案了。这时候，阿尔钦先生开始笑咪咪地讲

了，没有任何讲义，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完全围绕第一堂课提出的问题，但讲授的全部是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理。结果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过瘾至极。这种穷尽一切可能性答案的研究方法，正是要求并教会学生要不断挑战自己的思维极限。学生们总是不得不去问自己：“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吗？”“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更好的方案了吗？”这种近乎强迫式的追问，促使每一个学生在上课学习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大脑始终处于高速运转状态，不敢有丝毫懈怠，从而有效保证了芝加哥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

做你不会做的事，要求你具备处理复杂资讯、解决未知世界难题的能力。未来是不确定的。明天会怎样，有谁能知道？不确定性是人类面临的最深的恐惧之一。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凡事皆有规律可循。因此，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人们总是可以从前人的经验教训中得到某种教益，正所谓“失败为成功之母”。但是，纵观历史，又有多少事情并没有按照所谓的规律去演进呢？丘吉尔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如果不是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发生了那一件偶然的事，很多历史都会改写。”历史是重复的，但很多历史也是全新的。如果凡事皆可依照旧例执行，人类社会早就会陷入停滞而无法自拔了，更遑论发展和进步！

事实上，所有创造的第一步，都在于把没有联系的因素（这些因素可能是经验，也可能是观察到的现象）重新结合，将无序变为有序，将无形变为有形。要做到这一点，你就必须从经验和记忆中挑选出那些看上去毫无关联的因素，加以整理重塑，从而形成新的统一体。因此，如果你仅仅只是掌握了前人的知识，却没有相应具备处理复杂资讯和解决未知世界难题的能力，那么，有一天当你面对一个从来没有见到的事情时，你将不知所措，无所适从，当然也就谈不上解决问题和实现创新了。

联想到当前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做你不会做的事”真不啻是当头棒喝。我们恰好做了相反的事情。由于大规模的统一高考录取制度，为了追求更高的分数，学生被迫进行高强度的重复性训练，目的是不断提高对考试题目的熟悉程度和反应速度。思考过程被完全省略。也就是说，分数的高低只体现出反应速度的快慢，并不一定代表学生的智商高低。我曾经读过一篇《清华学子的完美学习方法》，其中出现最多的词汇是“熟练”——

“高考比的不是脑子，而是手。手熟一切okay，不熟什么也别谈”；要做尽所有类型的题目；同样类型的题目至少要做五遍，直到看到题目反应速度达到一秒；等等。实际上，这种训练模式之下的学生，已经丧失了主动思考的能力和欲望，即使考再高的分数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又想起美国的SAT和ACT（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洋高考”），考试内容和中学教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对此大惑不解——在许多中国人眼里，中学存在的价值似乎就是为了考试。SAT的组织者——美国大学委员会解释说，这是因为SAT关注的是“学生未来在大学和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和知识”，它的服务对象是大学，当然要满足大学关于人才选

拔的需求。至于中学教什么，怎么教，那是中学教育自身的事情，当然不需要他们关心。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学教育和大学入学考试无关，恰恰可以保证中学教育沿着自身教育规律的轨道前进，恰恰能够满足大学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正好相反。中国的高考首先强调要满足并适应基础教育的需求，“不超纲”，要“减负”，题目要尽可能简单，还要保障公平。至于大学能否通过高考选拔到适合自己培养的学生，高考本身并不特别关心，至少没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因此，倒也难怪，中国学生普遍被批评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方面比不上美国学生。试想，一个人整天在重复已经做过的事情，另一个人每天都在尝试做不同的新事情，谁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更强，不是一目了然吗？

（作者秦春华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来源：《光明日报》2014年8月13日

三、南开首设运动辅导站 让学生走出“宅生活”

为了更好地推动校园运动的开展，南开大学2014年首次推出了运动辅导站，让更多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下操场”。

记者了解到，与一般的体育社团相比，运动辅导站显得更为开放。每周的运动时间和地点会定时公布，方便学生根据兴趣安排课余时间。为了保证大家有充分的时间参与运动，运动辅导站特意将运动时间设置在学生的各个空闲阶段。

为了丰富校园生活，运动辅导站从周一到周日还安排不同的运动，包括跑步、跆拳道、游泳、排球等11个项目，学生可以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我们不再是局限于某个社团或某种运动，而是希望大家随时都能参与进来，真正做到全校运动。”社团联合会主席葛戴云卿告诉记者。

据悉，运动辅导站每周还会定期开展相应的运动指导活动，帮助更多想要进行体育锻炼的师生了解某项运动的入门知识和技巧，提升他们对运动的热衷程度。

来源：人民网2014年9月26日

四、上海财经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关注农村养老问题

近日，上海财经大学举行第七期“千村调查”暑期调研交流表彰会，围绕今年的暑期社会实践主题“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及对策”分享心得，扩展调研收获。

上海财经大学2014年度“千村调查”调研主题为“当代老人的中国梦：中国农村养老现状及对策”。该项目课题组包括1,069名学生和29位中青年教师参与的700支队伍，赴全国31个省区市731个行政村进行大规模入户访问和问卷调查，总计受访和问卷调查对象达17,480人。调查内容涉及农村老人家庭基本状况、身心健康状况、收支状况、生活态度等，重点关注养老方式

构成、养老观的代际差异、基本医疗和重病保障、养老价值观的嬗变、现有养老政策执行效果以及特殊人群养老等问题，体现出一定的深度与广度。

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4年9月24日